

4月7日,俄罗斯著名外交家、汉学家罗高寿(中国名,原名罗加乔夫)因病去世,享年80岁。在11日举行的罗高寿送别仪式上,我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称他为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、好朋友”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,罗高寿就在中国当大使,长达13个春秋。在北京外交使团中,这位俄罗斯大使在任时间之长,与中国缘分之大,对中国了解之深,到过我国城镇之多,在我国知名度之高,可谓绝无仅有。有人称他为“亲华派”,其实,一国大使是其派出的最高正式代表,对于驻在国,无所谓“亲”与“不亲”。如果非要把罗高寿划到哪个“派”的话,我觉得,称他为“知华派”比较恰当。他懂得中国的历史、文化、传统,了解中国人的感情、爱憎、性格。

“水到渠成” “你我都有福”

我知道“罗高寿”这个名字,是50多年前的事了。1960年秋,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翻译班学习时,汉译俄教材中,就有俄文版《水浒传》“智取生辰纲”的片断。翻译老师高铭对我们说,这部小说是由阿历克赛·罗加乔夫译成俄文的,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高雅吉祥的中国名字——“罗高寿”。高老师还说,法兰西有两个“仲马”,一大一小,俄罗斯则有两个“罗高寿”,也一大一小,大的就是这位《水浒传》的译者,小的那一个,也是翻译出身,“子承父业”,用的是同一个中国名字,他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翻译,听说还给毛

罗高寿:一生一世中国缘

◆ 李景贤

主席当过翻译。从那时候起,小罗高寿就走进了我的视野。由于中苏两国长期对立、对抗,“老死不相往来”长达十七八年,整整过了24年,即1984年,我才见到了罗高寿本人。当时,他已经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,而我在驻苏联使馆任政务参赞。他50岁刚出头,高个子,身材匀称,举止儒雅,看上去有点像德国人。他汉语讲得流利,略带山东腔。直到1987年,我才与罗高寿有了真正意义上的“零距离”接触。

1987年春,中断长达九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得以恢复。我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钱其琛,其谈判对手正是这位罗高寿,他时任苏联副外长。当时,我是中方代表团团员、中苏划界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。两国团长的谈判,轮流在北京、莫斯科两地举行。在谈判中,罗高寿态度温和,用语平稳,不纠缠细节,遇到分歧时,常常用汉语淡定地说:“让咱们再好好想一想。”谈判之余,双方团长有不少私下接触,有些不便在谈判桌旁说的话,就在这种非正式场合通气,甚至“亮牌”。也许因为我的汉俄双语记录还不错,钱副外长让我跟着他当记录,有时,还当翻译。

钱副外长第一次宴请罗高寿后喝茶时,这位苏方团长一坐下就用汉语说:“从前,我们两国的代表总是‘务虚’”,钱副外长一听就立刻接上话茬,用俄语跟进:“我们俩现在可以‘务实’”了,此言一出,两位团长即相视而笑:一句话刚出,另一句话即接上,严丝合缝,但均话中有话。当时,中苏边界谈判已进行过两次,长达近十年,有人想出这样一句俏皮话来形容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:“用子弹还没上膛的毛瑟枪打飞鸟,空对

空。”面对这种“务虚”“务实”的默契对话,罗高寿显得很兴奋,顺口来了这么一句:“钱部长,你说得真好,咱们现在可以务实了。汉语有句四个字成语:‘水到渠成’。现如今,水到渠成了,你我都有福啊!”罗高寿还向钱副外长讲了两段“题外”话,很值得回味。一段讲的是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反思。他认为,中苏关系那一大段不堪回首的岁月,本来是可以避免的,缺的是历史、客观、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两国间积累下来的问题。另一段则涉及邓小平同志。罗高寿一说起邓小平同志,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。他说:“文革”后中国的局面,能有魄力扭转过来的,只有邓小平一人。他还说,苏联要是也有个“他”(指类似邓小平的人),那就好办得多!

“划界大臣”

是个“难缠的对手”

中苏划界联合专家组会谈也在北京、莫斯科两地轮流举行,双方有个默契,在一轮会谈结束后,接待方的团长就会见对方专家组组长。罗高寿第一次见我时,用汉语轻松地交谈。他称我为“李”,表示亲切,我则以其名字和父名相称,以示尊敬。他一落座,就来了这么一句:“李,你的官可不小啊,比我这个官大出一大块儿。”见我不解其意,便说:“要是放在清朝,你可是个‘划界大臣’呐!”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与苏方组长魏列夏金有时谈得很顺利,有时则谈得很艰苦,比如在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上,互不相让。有一次,我一口气讲了70分钟,破了单次发言时长的纪录。为此,罗高寿半开玩笑地对我说:“李,我们

外长对你这个组长‘很不满意’,称你为‘难缠的对手’。”

我多次有机会与罗高寿闲聊,因此,对他的中国情缘,多少有些了解。罗高寿对我说过,中国是他的“第二故乡”,甚至还是“第一故乡”,因为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。他出生后刚满月(1932年4月),就随母亲到了乌鲁木齐,其父当时在苏联总领馆任职。五岁时,父亲转到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工作,他于是又到了这个“东方小莫斯科”,八岁时才随父母回到苏联。他先后三次到苏联驻华使馆常驻,共十六七年,任过职员、政务参赞、大使。当我问到给毛泽东主席当翻译的情景和感受时,他笑着说:“这个机会纯属偶然。1958年初,我第一次到苏联驻华使馆工作。11月7日晚7时,我们大使在使馆举行十月革命节招待会。你们的礼宾官事先通知使馆;周总理作为主宾出席招待会。我陪着大使早就站在使馆主楼前,恭候总理的到来。总理一下车,就兴奋地告诉我们大使:毛主席一会儿就到。大使一听喜出望外,而我呢,既高兴,又害怕,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翻译,可怎么给主席他老人家翻啊!当时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其实,主席很随和,人又幽默,只是他的湖南口音我听不大懂,幸好那天李越然同志在场,是他给主席当的翻译,而我呢,只译我们大使讲的话。”

“光荣的归宿”

1992年12月11日,我到驻俄罗斯使馆出任公使,正好在此前不久,这一年的4月,罗高寿被俄总统叶利钦派往中国出任大使。有一次,他回国述职,我作为使馆临时代办,

邀请他到使馆做客。罗高寿一见到我,就激动地用汉语说:“真感谢鲍里斯·尼古拉耶维奇(指叶利钦)对我的信任!我得尽心尽力,以不辜负总统的期望!”又说:“今年是我的本命年,60年来,我在国内外担任过多个职务,而‘驻华大使’这个职务分量最重,这是本人一个光荣的归宿!”在罗高寿大使的离任招待会上,时任中国外长的李肇星真诚地说:“中俄两国从历经波折到战略协作伙伴,罗高寿大使在这方面可谓功不可没!”

2005年春,罗高寿卸任驻华大使时,已过了古稀之年。有一次,他对我一位朋友“神秘”地说:“你大概不会相信,我和老伴把家安在北京城了。女儿在这里当常驻记者,已经好几年了。孙子在莫斯科上大学,读的是法律,第一外语选择了汉语。他也是个‘老北京’,来你们这个古都,大概有二三十次了。”他还感慨地说:“从我的父亲到我的孙子,整整四代人,都有一份厚厚的中国缘,而我本人呢,此缘则更深,从一出生直到现在,都七八十年了,其中有1/3时间,即二十四五年,是在乌鲁木齐、哈尔滨和北京度过的。”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,用中文写下这样一条条幅:“我的朋友遍中国。”

罗高寿晚年因车祸伤了右腿,走路得靠拐杖,有中国朋友见到此情景,便过去搀扶,他却总是不让,说:“不用,不用,还不到80呐,能算老吗?尽管拄拐了,我并不服‘残’!”他还曾幽默地说:“小平同志不是有句话吗,叫做‘胆子要大一点,步子要快一点’”,边说边拄着拐杖往前迈大步,作出快走的样子。

摘自2012年第9期《世界知识》



最上海

新民晚报，日发行量103万份，家庭订阅80万份，占上海报纸发行总量50%

新民晚报

第一大报 上海符号

